

谷书堂基金研究项目

GAIGE KAIFANG YILAI JINGJI LILUN
ZAI ZHONGGUO DE FAZHAN HE NANTI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论 在中国的发展和难题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经济理论课题组 编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经济科学出版社

谷书堂基金研究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论 在中国的发展和难题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经济理论课题组 编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 萍 于 源

责任校对：董蔚挺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邱 天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和难题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经济理论课题组 编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蓝马印刷厂印刷

新路装订厂装订

880 × 1230 32 开 12 印张 310000 字

2004 年 6 月第一版 200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 - 5058 - 4011 - 8/F · 3308 定价：1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和难题 /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经济理论课题组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6

ISBN 7 - 5058 - 4011 - 8

I. 改... II. ①南... ②南... III. 社会主义经济 - 经济理论 - 中国 - 文集 IV. F120.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2889 号

组长：谷书堂 副组长：周 冰

课题组成员兼资料组负责人：

罗润东 刘书祥

资料组成员：

杨俊青 郭建强 丑 晶 于长革

商 晨 王 璐 李海伟 吕明元

写在前面的话

这不是一部论文集，它是一部围绕中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的经济理论发展的、由系列调研报告组成的研究性著作。其中包括互相关联的四篇文章：“政治经济学的困境与出路”（副题为“我们需要一部《中国转型经济学》”）（谷书堂）；“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发展脉络简析”（副题为“对改革开放后我国增长与发展理论的发展之思考”）（罗润东）；“中国转型期改革理论的发展”（周冰）；“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结构的变革和发展”（刘书祥）。此外还有一部长达 20 万字的包括近 20 多年来经济理论著作论文资料的系统汇编。上述四篇论文都是在这部系统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写成的，因而我们认为把它作为本书的附录及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要的。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课题来研究，首先是考虑到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正在展开和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发生的变化巨大而又深刻。由于这些变化是在摸索中逐步实现的，因而它的每一步前进又都会提出若干难题要求我们解决和回答。经济学界的同仁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纷纷投入到这场围绕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讨论中去。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经济领域中的研究可以说既是成果累累，又是问题多多。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困境和中国经济学未来的走向问题，也正是在这种空前的机遇和挑战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

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这个转变过程迄今并未结束，然而仅

就刚刚过去这个阶段经济生活发生的巨变就很值得我们回顾和反思。它的重要意义之一，便是它提醒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中国的经济学应该如何适应这一转型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向经济研究所谷书堂研究基金申请了这一课题，并组成了课题组。由谷书堂教授和周冰教授担任课题组正副组长，成员有罗润东和刘书祥两位副教授。此外，课题组还组织了一批博士研究生参加和帮助搜集整理经济理论研究资料，他们是杨俊青、郭建强、丑晶、于长革、商晨、王璐、李海伟。此外，吕明元参加了前期资料搜集工作。

此项工作是从2002年3月份开始的。这一年几乎集中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经济理论资料的搜集、筛选、分类、加工整理的工作上，最后形成了包括四大方面的一部经济理论资料汇编。从2003年起，课题组的四位主要成员分别按照上述四个方面的题目进行了专门研究和写作。上述初稿完成后先后都在经济研究所的“双周”讨论会上作过报告，听取意见，进行修改，至2003年底全部完成承担课题时预计所要达到的要求。

应该说明，驾驭一个难度很大的题目，我们有时会感到力不从心。但既然已经承担了此项任务，已是责无旁贷，只能迎难而上。我们考虑即使这项研究成果还不够完善和理想，但只要较为准确地抓住了当时客观存在的若干要害问题，并经过实事求是的研究后提出了自认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观点，就仍然有它的学术价值，起码向学术界贡献了一种可供讨论的研究思路 and 观点。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作为本书附录的这份系统的资料，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来的理论界的思想结晶，可以说是前人尚未做过的一份基础工作。把它提供出来供社会各方面的专家参阅，应该说也是一种贡献吧！只是限于水平和阅历，有些工作做得尚有欠缺，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作者

2003年12月31日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政治经济学的困境与出路	
——我们需要一部《中国转型经济学》	谷书堂 (1)
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发展脉络简析	
——对改革开放后我国增长与发展理论的发展之思考	
.....	罗润东 (9)
中国转型期改革理论的发展	周 冰 (25)
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结构的变革和发展	刘书祥 (52)
附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研讨资料选编	
(1979 ~ 2001)	(71)
第一部分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	(72)
一、社会主义企业理论	(72)
二、社会主义消费理论	(88)
三、就业与社会保障	(108)
四、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运行	(122)
五、政府经济职能与宏观经济调控	(155)
第二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	(167)
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价值规律	(167)
二、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75)
三、计划和市场的结合方式	(181)
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	(192)

五、国有企业改革	(214)
第三部分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理论	(232)
一、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与周期理论	(232)
二、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理论	(268)
三、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	(292)
第四部分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矛盾 与演变	(317)
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317)
二、中国的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发展方向	(328)
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348)
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规范	(358)
五、经济学规范的批判与选择	(364)
六、过渡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	(369)

政治经济学的困境与出路

——我们需要一部《中国转型经济学》

谷书堂

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代表作。他在这部著作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做出了符合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性结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除了对个别重要问题的分析上有涉及社会主义社会的论断,如《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按劳分配的分析以外,并没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系统论,我们也不应该对他提出这种脱离实际的过分要求。所以,当我们谈到马克思经济学时,指的仅仅是《资本论》及其有关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著作。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①其中之一也是指的这一部分经济理论著作。

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和分析,是在十月革命后根据实践需要开始的,尤其是关于成体系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著作,则是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由苏联科学院集体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第一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论著作。^②在当时这部教科书曾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经典,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人都要学习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知识的宝库,中国自然更不能例外。在20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一边倒”是我们的国策。所以,很快在广大干部中就掀起了学习的高潮。然而实践是无情的,这部全面反映以计划经济为核心内容的苏联经济管理体制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页。

②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载《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和政策的著作，在现实经济实践的不断撞击下，逐步褪去了涂在它表面上的绚丽色彩，露出斑斑缺陷，最终则从人们的视野中完全消失。

顾名思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应该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现实的科学著作。苏联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曾红极一时，但由于它不是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理论概括，而是带有很大程度主观臆想的成分，因此根本算不上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地遭到实践的摒弃。

我国自己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从1958年以后开始的。当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要编一本，这是领导层出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决定。然而就我国广大编写者这支队伍总体情况来看，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来说还只是一批初学者，不论经济知识还是理论水平都有很大局限。另外，从客观环境看，1958年虽然我国宣称已进入了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又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原则性问题，在人们的头脑里还是一片空白，除了原来有限的几条抽象的教条以外，可以说大家都不清楚。试问，在这种条件下又怎么可能编写出一部像样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1958年以后，政治运动频繁，一个接着一个，先是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进入困难时期，1964~1965年又开展了农村的“四清”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在全国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特别是肆虐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把正常的工作都冲得七零八落，各省市的编书活动自然也只能顺势下马，无果而终了。

真正能够基本上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写作活动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独立地研究和贯彻“百家争鸣”最好的时期，特别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重要条件的方针，给经济学界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活力。促使我国经济理论的研究活动在全国范围内

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经济学界由此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然而由于当时我国经济学界思想解放的程度还有一定局限，加上我们自身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知识范围偏于狭窄并过于陈旧，面对着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方面，大家确实感到力不从心。例如，当时经济学界对改革方面能够提出的对策往往只限于商品生产、按劳分配、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等最一般的原则性的理论观点而拙于操作。于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实践方面我们开始只能学习以东欧改革起步较早的国家如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改革的经验，而且几乎同时也从这些国家引进了一些有关改革的理论著作，如卡德尔、布鲁斯、奥塔·锡克、柯尔奈等人的著作都被大量地介绍进来，用来弥补我们原有的改革理论储备的不足。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对此理论界分歧很大，决策部门也是左右彷徨。同时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再次陷于“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而不能自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这个目标的提出，正如古诗中说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和改革境界。

新的境界必然会遭遇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搞？对外开放掌握一个什么样的广度和深度？经济如何既能实现快速增长又能稳定持续发展？诸如此类的新问题摆在了中央决策部门面前，同时也摊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面前。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一场引进西方经济理论的新高潮出现了。这期间引进的已不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企业经济理论……在内的各种流派和各种专门的理论著作在很短的时间内都一股脑儿地涌了进来。于是在中青年学者中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广泛地用于研究工作中。大体上以20世纪90年代中

期作为一个分水岭，运用西方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当代经济问题已形成了一种时尚，它不仅可以同原有的用传统研究方法分析中国问题的学者分庭抗礼，而且颇有逐步取而代之之势。这种具有尖锐分歧的经济理论研究动向，不可避免地会牵动和引发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争论。于是一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大辩论便断断续续地展开了。

这场大辩论大体上是在 1994 ~ 1995 年为发端的。

在此之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曾出现过，但那时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不及这一次，而且这一次大讨论，是在客观上需要尽快地解决现实难题的背景下开展的，因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这一阶段的讨论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末。在如何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问题上，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巨大，至今并未取得共识。

如果把讨论中的各种观点加以粗线条地梳理分类的话，不外乎有以下几种思路：一种观点是不同意再创造什么“中国的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就是现代经济学，除此之外没有必要再撰写什么经济学。人们完全可以利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研究中国经济问题，那又有什么必要劳而无功地再去搞什么新的经济学呢？第二种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固然有可以借鉴之处，但由于其基本理论观点是错误的，是根本不适用于中国的。至于他在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究竟指的是什么，由于他没有提供现成的蓝本可供审视，因此很难对这种观点进行准确地把握。目前只有在教学中广泛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尽管人们对它的内容并不很满意，但似乎又都基本上默认它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第三种观点是：一方面承认第一种意见有一定的道理，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同美、英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的差别。作为发达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概括的西方经济学即使都是正确

的，也不宜不加分析简单地照搬到中国来，这二者之间还需要有一个中间环节使之结合，即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我在几年前发表的文章中基本上持这种观点。而《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① 尽管还很成熟，但我却是把它作为实践这一要求的实验品而公之于世的。

近些年我翻阅了一些有关的文献资料，并经过反复的思考，觉得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虽然原则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思路毕竟显得偏窄了些。下面我把近一年来的思考简要写出来，供诸位同仁批评和参考。在谈论主要观点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被混用的概念在本文中使用的角度做个界定。（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不是考据二者的来龙去脉和异同，只是为了理清我所主张的观点而暂时分别给它们一个定位）。在经济思想史中这两个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划分过，古典经济学时期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的时候较多，从新古典经济学以后则较多地使用经济学这个术语了。当然，他们先后研究的内容和目标也有一定的变化，至于把这两个概念分别定位于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则是从苏联开始的。到了中国则更上一层楼。不管这种划分方法是否妥当，为了不使我所谈的问题因概念混淆而纠缠不清，在这里把马克思的侧重研究生产关系的理论体系我叫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世界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奉行的以研究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则叫经济学。

我认为回答“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可以有两种并不互相排斥的思路。一条思路是循着人们通常理解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线继续走下去，其中包括按照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马克思、特别是列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某些具体结论由于事实证明并不完全符合后

^① 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00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修订再版。

来实践的发展，这些可以抛弃。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所作的科学分析却并未过时，只是由于条件的变化、矛盾的尖锐程度和表现形式有所缓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新表现和发展趋势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对于我们正确和全面地认识当今这个时代和社会，以及制定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科学对策，无疑是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的。诺思也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①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或者说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主义现阶段作为对立的阶级虽然已经基本消灭，但是还存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别，它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一般地说不是对抗的，但若不注意或处理不当，它也可能发展到相互对抗的程度。所以认真地分析研究现阶段社会阶层之间的地位、利益差别和矛盾及发展的趋势，对于我们认识当前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特点以及制定调节矛盾推动社会进步的对策无疑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基本思路和分析方法仍旧是适用的。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方法”。^②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一般所谓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有差别的。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非常有必要创建以研究资源配置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这两门学问可以并存，并互相补充。至于这门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无区别，我在后面将会提到。

另一种思路则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着眼于经济发展与

①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文版）1994年，第6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06页。

资源配置的经济学融为一体，创建一门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它既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又包括这一时期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分析框架。这种处理办法表面看起来内容显得繁杂一些，不符合传统的观念，但它的优点却是可以以综合性的经济基础理论的面目维持它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领域的基础理论的指导地位。这样，它既可以从上述诸应用经济学科中吸取理论发展的必要营养，反过来它又可以向各相关经济学科提供基本理论的支持。

我在这里说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准确地说，在目前就是转型期中国经济学，它要求从中国当前这个阶段的实际和特点出发，运用实证的和规范的研究方法，抓住转型期一些重大的具有经济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得出具有规律性的结论，用以指导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并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独特理论体系。从理论的角度分析，生产方式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下向前发展的统一体。因此，把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生产方式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是完全有根据的。

从经济社会角度考虑，所谓经济转型我认为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型。第一，经济体制的转型，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经济制度的调整（由单一的公有制调整为多元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第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即由粗放的数量扩张型的增长方式逐步转变为集约的以效益为中心的符合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型增长方式。这个过程是以技术进步为先导，以经济体制转型为基本保证，以经济结构调整为关键的各种因素转变导致的综合性结果。第三，则是以前两个转型为前导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并加速城市化过程。即由二元经济转变为现代一元经济，这是经济和社会紧密结合的又一个转型过程。具体说，这是由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由现代工业支撑的和现代科学文化装备起来的现代城市经济体和生活区。这样一种变革是消灭城乡重大差别的一次飞跃。

此外，在实现经济社会重大转型的过程中，我国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过去经过的途径不同，政府的经济职能不是全面萎缩，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方面都需要借助于政府的大力推动。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发运作，这种转型期会拖得很久，有了政府的推动则好像有了一个加速器，会大大缩短这个转型过程。所以，研究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配合功能。一个健康的市场运作机制的建立，离不开市场各个主体之间的诚信合作活动，先进技术的应用也离不开人们的创新意识和接受新事物的观念，而城市化过程更是需要人们树立互相帮助走共同富裕之路的整体观念，这一切离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都是不易实现的。所以，在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中，要把视野更放开一些，不能只局限于孤立地研究经济领域的问题，同时要紧密关注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尽管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仍是中心环节。

归结起来，政治经济学如果仍按照侧重研究生产关系这个主题，尽管有它的作用和意义，但在经济学科领域中它不再拥有经济学科理论基础的地位，充其量它只是经济理论基础的一个侧面。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形成的一套研究思路、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很有启迪的，我们要好好学习和借鉴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并不是植根于我们这种处于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生活，所以它也不能简单地拿来充当我国诸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如要它起这种作用，尚需进行一些必要的加正和调整。如上所述，转型经济学从理论和方法看，它不是原创性的，因为它基本上是从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特别是它们的分析框架和方法中吸取营养的。所以，从经济学科大排队来说，它应列入第二层次的理论经济学范围。但具体对中国而言，由于它研究的对象是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的，它包罗了中国转型期各种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它又是最具基础性质的经济学科。所以，我认为我们迫切需要创建这样一门经济学。